

丛书总主编◎季羨林

主编◎牧惠 蓝翎 朱铁志

杂文卷

真话

的

空间

3

中国当代文化书系

季羨林题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化书系·杂文卷
丛书总主编 季羡林

真话的空间

主编 牧惠 蓝翎 朱铁志

(三)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话的空间:杂文卷/牧惠,蓝翎,朱铁志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5(2002.1重印)

(中国当代文化书系/季羨林总主编)

ISBN 7—80094—516—2

I. 真…

II. ①牧…②蓝…③朱…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6949 号

真话的空间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3 字数 857 千字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4—516—2/I·322

定 价:210.00 元(全七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中国当代文化书系》顾问名单

钟敬文	张岱年	卞之琳	林 庚	陈 原
任继愈	冯亦代	严文井	周汝昌	范 用
黄苗子	郁 风	丁 聪	吴祖光	郭预衡

总主编：季羨林

编委会名单

季羨林	牛 汉	林斤澜	姜德明	邵燕祥
汤一介	乐黛云	宗 璞	牧 惠	高 莽
李国文	谢 冕	王德后	王富仁	钱理群
刘梦溪	柳 萌	母国政	舒 乙	朱 正
张思之	张抗抗	李景峰	斯 妤	邓九平

执行主编：牛 汉 邓九平

本卷策划人：张家勋

中国当代文化书系

季羨林题

孔子教书

刘大杰

从某些方面说，孔子是一个好教师。“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发愤忘食，不知老之将至”的劳动热情，祖国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等等，都是他的光辉面。汉朝及其以后的孔子，弄得面目全非，那是后人给他化了装，涂了油彩，与孔子本人无关；原始的孔子，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在《论语》一开始，他就对学生们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就好得很。他又说：“过则勿惮改”，又说：“温故而知新”，又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些教训，放在我们今天的新社会里，还很有意义，还很新鲜。

孔子有三千学生，差不多等于一所综合性的大学，真是桃李满天下。孔子教书有好些特点。首先他是注意道德品质的培养。颜回、曾参的粗衣淡饭刻苦钻研的优良品质，孔子一再表扬。宰予懒惰，夸夸其谈，孔子严厉地责备过他，说他是一块

不可雕饰的烂木头。并且感叹地说：“我从前对于人，听了他的谈话，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于人，听了他的谈话，还要看看他的行为”。这不仅教育了宰予，也教育了我们。

其次，孔子教书能了解学生们的优缺点以及他们的特长和个性。曾参的德，子路的勇，颜回的好学，子贡的聪明，孔子常常提出来。孟武伯有一次问孔子：“冉求怎样呢？”孔子说：“可以做个县长”；又问：“子路如何呢？”孔子说：“可以做个田赋局长”；又问：“公西赤如何呢？”孔子说：“公西赤吗？他穿起礼服来，招待外宾，那是刮刮叫的！”孔子对于学生情况了解得那样清楚，等到统一分配的时候，那是多么方便。今天我们有些人就不然。人事科问到我们的毕业学生，谁当助教好，谁作研究生好，谁做编辑好？……我自己就回答不出来。

孔子教书的重要特点，是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孔子教青年们学，更教他们思。要他们把学到的东西消化吸收，加以细细地思考，再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温故”不只是抄笔记，背笔记，图考一个五分，主要的是“知新”；“知新”是从思考的过程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必须这样学术研究才有成就。孔子那样欢喜颜回，就是因为颜回的思考能力强，他能“闻一以知十”。闻一知十固然很难，但如果青年学生只能闻一知一，那我们教书是失败的。然而在今天，闻一知一的情形却不是没有。教了《东山》就懂《东山》，不教《采薇》，就不懂《采薇》；教了《三吏》，就懂《三吏》，不教《三别》，就不懂《三别》。没有培养学生们刻苦钻研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就不能“温故而知新”。子夏谈“巧笑倩兮”那首诗，子贡谈“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时候，孔子笑容满面，高兴极了，看见高足们能运用独立思考能力，有了新的启发和见解。所以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

学而不思固然不好，思而不学也是不正确的。今年暑假开始，大学的教学计划修改了，学时减少了，学习的环境改善了。是不是以后只是“少学而多思”或是“不学而专思”呢？这种想法都是不对的。如果这样那就是“空思”、“单思”、“片面思”、“没有内容的思”，是思不出什么东西来的。我们必须在勤奋学习的基础上，在丰富知识的基础上，发挥思考能力，才能有所进取，有所批判，有所创造。我们必要在学习、思考，思考、学习的反复过程中，才能有真的创见；我们必要把学习、思考辩证地统一起来，才能有真的成就。我们要多读原始材料，要多使用工具书；要钻得进去，又要爬得出来。所以孔子说：“思而不学则殆。”

阿 Q 为何要姓赵？

安文江

喝了两碗黄酒的阿 Q，手舞足蹈地宣称他也姓赵，和赵太爷原是本家，结果让赵太爷赏了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这情状在今天看来，未免有点荒唐。你阿 Q 何必与赵太爷攀亲家？而赵太爷又何必霸道到别人姓一次赵就赏嘴巴？但在阿 Q 那个时代，这倒是不难理解的。你看，阿 Q 一说是赵太爷本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倘若赵太爷不让地保传阿 Q 到赵家，挨揍不说，还“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那么，赵阿 Q 兴许会是另一种活法。看来，宣称自己姓赵，正是阿 Q 的难得聪明，只是没成功罢了。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是阿 Q 被砍头前的壮语。几个二十年过去，阿 Q 的确没有绝种，不只“又是一个”，而是“又是一代”。单说和赵太爷攀本家这一条，现代阿 Q 们就比老 Q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某日报曾报道，新金县找到了岳飞的后裔；某文化报则宣示，周立波乃三国名将周瑜第六十六代孙；某文摘报甚至考证出，周总理百年之前和鲁迅先生是同宗；而船王包玉刚，据说是包公的嫡传……是真是假我不清楚，反正全是光耀史册的人物，即便有误，亦无伤大雅；又有谁和遗臭万年的人物攀本家呢？据考证，孟子倒是庆父的后代，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孟子于是改姓孟了，可见老祖宗的家谱是爱憎分明的。

读多了这类文字，倒让我没脸见人了。翻翻史书，姓安的本就不多，实在找不出什么能增光添彩的祖宗，唐朝倒有一个，却是“安史之乱”的混蛋安禄山。岂不呜呼！

寻祖宗、修家谱未必没有价值，但宗族观念却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遗毒。阿 Q 宣称姓赵，挨嘴巴的是他自己，于社会似无大碍。但现今很有些穿西装的阿 Q 们，割不断“老子也姓赵”的宗法情结，同宗同姓以至同乡，皆可成为钻营的孔子、腾达的桥板、投机的招牌。某乡政府除两名门卫，炊事员司机都是同姓同乡，更不说头头脑脑非亲即故了。某家全国闻名的公司，本是乡镇企业，总经理直率地对精明能干的助手说：“我可以给你副总的待遇，但不能提你当副总。因为你是外地来的。”

同姓的不够，找同族，同族不够，寻同乡……这类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做派，我们并不陌生，媒介也时有披露。寻常百姓自然少有攀名人作祖宗的兴趣，但很实惠地找一个活着的同宗同乡却不鲜见。比如“×省长是我姨家的三舅”，“×局长

是我表兄的岳父的弟弟”，往往能让人“肃然的有些起敬”，于是关系顺了，后门开了，比公章、介绍信有效多了。

费孝通先生说，现代中国人应该有“地球村”的大胸怀、大视野。这当然很正确，但要做到却很不易。连一国一省都装不了，更遑论整个世界！

改革难在观念，开放重在胸怀。倘若“老子也姓赵”的阿Q气不消，这现代化恐怕为期尚远。

或许有人会笑我：“你这个安禄山的子孙，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立马收笔。谁让我姓安呢？……

1997年5月

“我 化”

安立志

这里的“我”，是一个抽象概念，其地位大抵与“中体”的“中”相差不多。

顷见报道一则，说是国产夏利汽车隆重推出新车型。其实，这个“新”不过将舶来国的两厢式改成了三厢式。在国内生产的轿车（姑且这样称之，下文将涉及）中，原先夏利没有尾厢，加出一个“尾巴”，不仅破坏了原车型的紧凑性和空气动力性能，售价还要增加2万元，然而，生产厂家却很坦然，因为他们知道，在中国的某些城市，结婚迎亲不坐两厢式已成习俗，原因是两厢式“有头无尾”，太不吉利。尽管这种车是为中国从官员车向民众车过渡而引进的新车型，但由于轿车毕竟是一种舶来“文化”，因而也就有一个从“异化”到“我化”的问题。

当我们的同胞离开住于斯长于斯的黄土地，走向世界来到充分“异化”了的环境中，两种文化就会很自然地因“我化”

而发生观念的碰撞。高晓声的小说《陈奂生出国》，就从多侧面涉及到这一问题。陈奂生作为一个虚构的中国农民的典型，借改革开放之东风，终于有了平生第一次的出国机会。这个“上城”时连沙发也未见的庄稼人，面对光怪陆离的外部世界，按照固有的观念，开始了他的“我化”过程。他利用为艾教授充当临时看门人的机会，将其门前几十美金一平方米且与邻人订立了共保公约的草坪挖掉一大片，以作为帮助其建立“菜篮子工程”之基地。而使用的工具，竟是该教授为纪念林黛玉小姐的葬花事件煞费苦心从中国弄来的纪念品——“花锄”。动机也很别致，即纠正美国知识分子轻视体力劳动的“劣根性”，并力图教会他如何是“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从而在蔬菜供应上达到自给有余。陈奂生先生不知道这种由自然经济的小农意识所导演的极似“公公背儿媳，受累不讨好”的“我化”过程——改造对方以合于自己的“返祖”过程，给华如梅夫人造成了多大的麻烦。

“麻将桌边，电灯代替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此为“我化”的旧迹，以至于鲁迅先生写道：旧中国“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旧中国早成历史，“染缸”尚在否？“德”、“赛”二先生进入中华古国。大抵肇始于本世纪初的欧风东渐，也许正是因了某些国人极强的“我化”功能，于是“赛先生”和“德先生”也开始了被“我化”的进程。时见报载，开元寺内，录音机代理了“哀嚎”，通都大邑，微电脑用之于算命。“CAR”（小型载人

汽车)“我化”为衙门化的“轿车”，民主也成为残杀无辜的“仪式”。前几年，《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新闻就为后者提供注脚：“黔西山民愚昧又荒唐，举手表决冤杀外乡人。”这是一幅怪异的图景：事主——一群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国民；手段——典型的民主义决方式。一面是无法无天的虐杀，另一面偏要体现出“选民”意志的程序。也许在这帮山民的眼里，“民主化”原本就应当是这样一回事。“东渐”“欧风”的被“我化”，使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样付诸“表决”了。多么惨痛的事实！

鲁迅曾深刻嘲讽过“爱国的自大”，这“我化”有时也表现出来类似病症。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当然是“我化”，它反映了大汉先民的“引进”先鞭；魏孝文帝的崇尚“汉官威仪”，也是“我化”，因为从拓跋氏眼里看到了华夏文化的优越性。历史上南蛮北狄西羌东夷，历来被汉人政权视为“我化”之对象，然而，蒙古人人主中原，一句“元朝时我国版图最大”，于是变成了“我化”；女真族君临诸夏，一句“我国治世当推康雍乾”，终于也是“我化”。

两厢式的夏利被改装出了尾巴，艾教授的草坪被改变成菜畦，加之“赛先生”或“德先生”被“我化”，“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鲁迅语）

于是，“我化”也变成了“改革”！

“化 我”

安立志

五年前，我曾在《文汇报·笔会》写过一篇《“我化”》，今天突发怪想，想起了这个题目——《“化我”》

我曾将《“我化”》中的“我”，解释为近似“中体西用”中的“中”，而在“化我”中，需要解释的不是“我”而是“化”。在这里，“化”，取融化、消灭、化解、融溶的涵义。当然，这里的“我”，也不就是安立志，而是作为个体、自我的抽象。

那么，“化我”，能将“我”“化”到哪里去呢？那是一个极好听、极逻辑的所在——“我们”。

将“我”化人“我们”，是好事还是坏事？不好简单言说，今年第三期《随笔》刊登了两篇有关“我们”的文章，一是何满子的《踵邵燕祥辩“我们”》，一是筱敏的《札米亚京的现实》。前者讨论的话题，笔者也曾涉及过，在此不赘。后者提到札米亚京的作品《我们》，读来很有些意思。

在札米亚京这篇自称为“新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作者讲述的是，在未来的某个年代，有一个“惟一国”。在这个社会中，作者预告了“我”的意义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我的整体——“我们”。在这个“惟一国”里，没有“我”的位置，只有“我们”是至上的，作为“我们”的最高代表，则是“至高恩座”，而“我”都化成了围绕在“至高恩座”周围的“号码”。

在这个“惟一国”里，体现“我”的东西，比如个体生命、个人权利，都变得毫无意义，“我”就是一粒砂石，只是垒砌金字塔的“原料”。这个以“我们”为特征的“惟一国”，就是由千百万面目模糊的“我”堆叠而成的硕大无朋的金字塔，塔尖上矗立的是神一样的“至高恩座”的绝对意志。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1995年底在《读书》上读到的刘军宁那篇很有名的《毋忘“我”》。提倡“忘我”的动机旨在“化我”。在中国传统伦理学里，“我”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我”等于“个性”，等于“自私”，等于“贪欲”。于是，在古代的自称里，凡是涉及第一人称的地方，就只好使用“在下”、“鄙人”、“奴才”这样自轻自贱的字眼。由于漫长岁月的熏陶，终于使“我”名声败坏，也才提出了许多“化我”的思路和做法。

与“我”相对应，“我们”则是极其荣耀的。“我们”等于“单位”，等于“集体”，等于“社会”，而这些名义都是冠冕堂

皇，不可亵渎的。正因如此，“我们”才演变成为化解了“我”的乌托邦。“化我论”所要求的人，是不思考、无感觉、不判断、只待命的“肉体”，其实质是要其交出生命和思维，只作为“鼠标”式的工具而存在。例如“史无前例”的时代，“愿作革命一块砖”，也曾是“小将们”刻意追求的境界。实际上，对于“我”的化解，正是所有以“我们”自居的中国古代专制君主的衷心希冀。“有了众人的忘‘我’，才有埃及的法老、中国的帝王、德国的希特勒的不忘‘我’。”（刘军宁语）

我对埃及的法老不知其详。在故国，中国的臣民，将“我”化解为一堆“草民”、“蚁民”，因此，在皇上眼里，看到的只是一片匍匐的屁股；在德国，该国的“公民”，将“我”化解为一堆抽象的“符号”、“号码”，于是“我们”才真诚地呼喊：“元首，我们属于您！”

但从这句口号，人们却会发现，由鲜活生动之“我”化入的混沌模糊的“我们”。名义上是一个群体，一个组织，一个帮派，实质上也是“我”，是一个特指的“我”。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我”——“我们”——“我”。在这过程中，“我们”是对芸芸众“我”之否定；从“朕即国家”来推断，否定了“我们”的“我”，无异于“陛下”、“元首”或“至高恩座”。处于“完成阶段”的这个“我”，并不是前面那个“我”的简单重复，当然更不是什么进步和提高，而是倒退和跌落。即通过对所有“我”的化解，而强化了的一个特定之“我”。